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历史语境、表现形式及艺术特征

赵 静 静

(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抗战爆发后,内迁到重庆的广大艺术院校师生和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抗战主题宣传画,主要包括简易直白的木刻版画、幽默机智的漫画,这些作品以选题的战时性、艺术语言的战斗性和作品刊发传播的战地性展现出直观夸张的表现力、生动通俗的叙事性和对妇女儿童等全民抗战的感召力,成为揭示日军暴行、鼓舞民众团结抗战、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思想武器。通过战时重庆宣传画研究可直观地感受到战时的美术工作者等艺术界人士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深厚的民族大义,及其执着的艺术精神。

关键词:抗战美术;宣传画;木刻版画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4-0098-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20409

全面抗战爆发后,内迁重庆的广大艺术院校师生和美术工作者,创作出大量抗战主题宣传画,这些作品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学界对抗战时期的美术有不少关注,如杨悦、汤祖雷的《重庆抗战木刻版画的审美特征与当代创作启示》概述了抗战时期重庆木刻版画的发展状况、审美特征及其美学价值对当代美术创作的启示;^[1]张怀玲的《抗战时期重庆漫画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则从抗战时期重庆漫画发展方面进行论述;另外,聂宏伟的《宣传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敌艺术宣传上的运用分析》是以解放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政治宣传策略为引线,从艺术的角度探寻当时的宣传画在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中的表现方式及风格特点;^[2]霍楷的《伪满时期抗战宣传画艺术特点和美学风格研究》则以沦陷区东北抗战宣传画的题材展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国”而采取的侵略行径,塑造了系列奋斗抗争的艺术形象。^[3]而有关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研究并不多见,重庆是抗战大后方内迁美术工作者和艺术院校师生的重要创作阵地,他们利用当时有限的条件制作出了大批以抗战史实为主题的图画,因此,对这一时期重庆宣传画作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历史语境

(一)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概况

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救亡图存的宣传此起彼伏。抗战宣传画从符合大众审美的需求出发,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后方活跃的美术队伍为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鼓舞民众斗志发挥

收稿日期:2022-01-11

作者简介:赵静静(1985—),女,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设计历史及理论。

基金项目:2021年度重庆市教委科技研究计划项目“地域性文创产品设计的情境构建策略研究”(KJQN202100537)。

了应有作用,在烽火岁月里创作了揭露日军暴行、讴歌前线将士、宣扬反投降反汪逆、反映大后方建设等众多题材的抗战宣传画。

这些通俗易懂的宣传画借助政治中心的凝聚力、报刊媒介的传播力和陪都展览的辐射力持续向民众传达着抗战的思想意识,激励民众同仇敌忾、共御外侮。频繁举办的各类全国性展览为民众及时了解前线战事提供平台。《新华日报》等媒体以抗战主题的专刊发表木刻漫画作品、评论文章、展览报道等,如1940年9月1日《新华日报》刊登“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第十四期《抗敌漫画》出版”的作品,内容有叶浅予的《明日中国——连环画》《东西新秩序的一课》、张文元的《救不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廖冰兄的《炸的面面观》、张谔的《纸弹攻势》、张光宇的《飞石子与配玻璃者》、陆志庠的《日本内幕》、王语今的《废物利用》、露德的《啃!中国是这么大的?》、杨诃的《傀儡近卫的再登台》等抗敌漫画。《新蜀报》专门开辟副刊“七天文艺”“半月木刻”刊登抗战木刻作品和名家评论文章,如1941年9月19日“蜀道”副刊第496期刊载夏佛图《古城之战》、张望《海军战绩》、邓年《母与子》、张时敏《克复城堡》等抗战木刻作品;刘铁华的《略谈木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李桦《木刻运动的二重性》等名家评论,同时发表王琦的《学习苏联木刻家的严谨精神》、铁华的《苏联木刻与中国木刻》等有关木刻的交流性文章。这些作品及文章对鼓舞军民士气、团结教育民众、讽刺和瓦解敌人、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二)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繁荣之因

抗战宣传画之所以在当时盛行一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重庆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转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大批机关、院校等单位也陆续迁入,有大量美术工作者云集重庆,其中如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林风眠,漫画家丰子恺、张善子,版画家张光宇、叶浅予、廖冰兄、张乐平、丁聪、王琦等人都来到这里,可谓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这些美术工作者胸怀民族大义,并艰辛地进行着艺术探索,为繁荣重庆的抗战美术做出积极贡献。

相应的机构如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也设在重庆的凤凰山上,这里东望嘉陵江,西眺歌乐山,磁器口古镇就在脚下,环境十分优雅。这对内迁重庆的艺术院校师生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可以陶冶师生们的情操,并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4]359}

重庆作为当时的战时首都其政治影响力也是关键的一点,使得集聚此地的木刻专家可以专心创作外,还有机会参与和举办各种作品展。如叶浅予漫画展、王琦木刻展、王琦画展、刘铁华木刻展、高龙生、汪子美幻想曲漫画联展等都在这一时期成功举办。其中每年10月10日的国庆日都举行木刻展,规模和影响很大,来自全国各地的木刻作品汇聚于此,为他们观摩、学习创造了极好条件。据统计,当时展出而收集到的作品共计255件,其中延安带来的木刻作品30件,观众达到15000人次。^{[4]368}同时,还开展国际交流展,如中国木刻研究会主办的世界版画展览,参展作者除中国艺术家外,还有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印度、西班牙、比利时等人士;江津图书馆主办的盟国画展,内有苏联版画200余件,还有美国无线电传真漫画,以及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新绘之抗战画数百件,每日来参观人数达七八千人;1945年7月28日抗战胜利前夕,在中正路工人福利社由中国木刻研究会与星期漫画社联合主办的美国画家琼斯画展等。相关画展通过政治中心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而传达出积极的抗战信号。

二、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表现形式

当时全国有三个专门性的美术类抗敌协会,以方便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5]木刻和漫画家所属的美术界抗敌协会,经常跟随组织开展抗战宣传活动。许多木刻和漫画作品从题材到形式,都具有浓厚的“宣传画”特点,又有一定的“漫画化”倾向。这一阶段的木刻与漫画几乎全以揭露敌人暴行、激励民众、鼓励将士等为主题,抗战宣传效果显著,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表达形式。

(一) 简易直白的木刻

木刻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艺术。鲁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为大众而艺术”的新木刻运动,融入西方木刻的特点,在多流派竞争中异军突起。抗战时期,一大批木刻家集聚重庆,在新木刻运动的作用下,木刻成为抗战宣传画的首选。这一艺术黑白对比强烈,视觉冲击力强,一版多印的功能极有利于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目的。木刻作品也得到当时各类媒体的积极刊载,如书籍报刊的封面插图等都大量采用木刻画为饰,凸显了它的特殊艺术。

抗战时期,李可染的宣传作品最多,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创作出难以计数的壁画、纸画等宣传作品。武汉失守后,他跟随抗日宣传队几经波折来到重庆,继续用宣传画揭露日军暴行,歌颂抗日英雄,呼吁同胞坚持抗战,成为抗战宣传画的创作先锋。^{[6]21} 其中《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这幅宣传画最精彩且广为人知,他笔下的日寇造型鲜明独特,影响极大,成为读者认知日军形象的典型。

王琦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大量简易直白的木刻作品,纷飞战火坚定了他救亡图存的信念,警醒他学成归来,救国救民。^[7] 在重庆南岸精益中学工作时期,他开始陆续为共产党创办的杂志《战时青年》创作每期的封面木刻,作品一度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赏。王琦认为抗战木刻在重庆的发展是最辉煌的,报刊天天登,读者天天见,在润物无声中起到了抗战宣传功能。^[8] 这期间,他还组建了中国木刻研究会,并撰写了多篇评论文章。如原载于《新蜀报》的《介绍木刻艺术》《论刀法的理论与实际运用》《木刻工作者与反侵略》等,使得抗战宣传通过木刻艺术而深入人心。

(二) 机智幽默的漫画

丰子恺曾说:“(从宣传效果看)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9] 王琦在对漫画家廖冰《猫国春秋》展览的评论中也说到:“社会的混乱把漫画家的笔尖引上更积极的道路,它在形式上的夸张,也可以更尖锐的刻画出黑暗的多方面,漫画始终是在冲锋陷阵短兵相接时的一支强劲有力的队伍。”^{[10]551} 漫画由于其幽默风趣、贴近生活、感染力强等特点成为当时十分盛行的创作形式,爱好者从小学儿童到大中学生,成千上万,读画的是广大市民和工农民众,其机智幽默令人捧腹的风格和抗战讽刺文学一起成为当时读者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内容。针对当时四川广大农村的农民,学生们在进行抗日宣传时,将漫画与演讲结合,并配以适当的音乐,使他们一看便心领神会,起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称得上是“最轻便的一种宣传武器”。^{[4]360} 美术工作者纷纷用漫画抒发对日寇暴行的愤怒,漫画宣传队在四川、重庆及周边地区常组织多种展览,由众多漫画家合力举办的漫画联展影响力极大,曾一度引发轰动效应。

叶浅予在战时以漫画和生活速写记录时事,他除任上海《救亡漫画》的编委外,又号召爱国漫画家共同组办了享誉中国漫画史的“漫画宣传队”,开启救亡图存的美术宣传之路。同时他又参加了国民党政治部的三厅,^[11] 以不同的身份进行抗战宣传。国民政府不愿支持他们,他们依然无条件地辗转各地,绘制招贴漫画,编辑印刷漫画刊物,向广大民众和普通士兵开展抗战宣传。1940年初,漫画队辗转到达重庆,宣传队的经费也因郭沫若厅长在三厅改组后遭到排斥而停发,后又经皖南事变,叶浅予在重庆召集在渝会员商议,正式宣布漫画宣传队解散。^{[12]30} 在重庆时期,他发挥自己最擅长的速写艺术,创作了百余幅《战时重庆》速写,最为人熟知的《香港受难图》就是在此时创作的精品。

丁聪是清末民初著名工笔画家丁悚之子,严峻复杂的形势使得他的艺术救国之路并不一帆风顺,“皖南事变”使他辗转流亡。但他仍坚持创作,且影响颇著,夏衍曾评价他的作品是画中可观时代、见社会,也见其风格与人品。^{[12]27} 流亡香港期间,丁聪的作品因受宋庆龄欣赏而名扬海内外,当时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组织的宋庆龄在第一次抗日宣传画展上买下了他的作品《逃亡》,并以“保卫中国同盟”宣传画的名义大量印制并散发到海内外。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他又从香港流亡到重庆,在这里继续投身到抗战宣传画的创作中。

(三) 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

抗战时期,新兴木刻和漫画是战争年代的特殊画种,并作为抗战宣传画的主要创作形式。此外,还

有以创作人民领袖、抗日英雄为题材的油画、雕塑等,与国画、木炭画、年画等同时发挥各自的艺术价值,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美术史。^{[13]5} 林风眠的一些小品式绘画在 1940 年《抗建通俗画刊》上陆续刊登,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作“抗战宣传画”的状况,如《流亡》《杂写》等作品极负盛名。^[14] 贴春联、贴年画是中国人过年的传统风俗之一,千百年来年画中的门神是钟馗、秦琼、尉迟敬德。在抗战时期,抗日门神也有了新的塑造,如赖少其构思新颖的《抗战门神》年画,它将抗战内容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门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作品一经问世就在大后方引起广泛的呼应,老百姓纷纷将其请回家贴在门上,营造出空前热烈的抗战氛围。^{[15]147-150} 其他美术工作者也积极地创作了大量作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抨击日寇暴行,使抗战宣传画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三、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艺术特征

《新蜀报》第 27 期发表陈小南的《扩大绘画的新题材》一文说:“抗战第一期的绘画,描写的题材是非常狭小的,单纯的,只是暴露敌人的残暴,战争的残酷和民众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极消极的题材,始终只会使人起一种可怜的同情,而不会使人更坚强的抗斗意志,所以第二期抗战的初期,绘画也和其他的艺术一样,由消极而步入积极的新阶段,前进的艺术家用他简单的木炭、铅笔、雕刻刀,以至于最拙陋的色素,走出了象牙塔,冲进前方的阵营……”^{[13]62}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宣传画的主题有随着战事的发展而推进的趋势。

(一) 题材的战时性

重庆抗战宣传画题材丰富,紧扣战时主题,归纳来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包含以下方面:揭露日军暴行、讽刺日军丑恶、反映军民英勇抗战、前线抗战将士、参战的妇女儿童、重庆大轰炸、反投降反汪逆、大后方建设、优待俘虏、反战、盟国、盟军等众多题材,这一幅幅画作犹如冲锋的号角,起到了团结教育民众、打击瓦解敌人的有力作用。^{[16]2} 笔者根据相关史料,整理出重庆抗战宣传画的系列作品,具体见表格 1。

表 1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题材概况

主题	作品	创作原型	创作者
揭露日军暴行	《日军侵入朝天门》《流亡》《灾难的回忆》《为仇恨而生》《香港受难日》组图等	受难民众、日军	叶浅予等画家、学校学生团体
军民英勇抗战	《在抗战的路上前进》《继续一二八的精神驱逐日寇出境》《保卫大西南》《抗战的苗胞》等	战士、抗战民众	廖冰兄、陆志庠等
前线抗战将士	《保卫我们的领空》《游击太行》《邓少愚将军造像》《哨兵》等	战士、将军、英雄	刃锋、谢梓文等
重庆大轰炸	《重庆轰炸后》《野蛮的屠杀》《肉弹勇士》《山城大火》等	重庆受难群众	刘铁华、尚莫宗等
团结抗战	《团结到底 抗战到底》《合力歼敌》《为巩固团结而努力》等	国共形象、抗战民众	张谔、汪子美等、其它团体组织
反投降反汪逆	《汪、汪、汪》《扩大反汪运动》《后方的汉奸》等	卖国贼、汉奸	黄尧、张谔等
劳军	《出钱劳军》《援助前方战士》《送茶水》等	爱国民众	新波等
大后方建设	《努力后方建设》《滇女修路》《加紧生产》等	大后方爱国民众	张时敏、宗其香等
重庆印象	《嘉陵晓色》《防空洞中》《赶场》《成渝路上》等	嘉陵江、防空洞、重庆特色	王琦、刘铁华等
妇女参战	《中国妇女英勇地参加抗战》《妇女时战》等	妇女	赖少其等
儿童参战	《少年先锋队》《教育儿童》等	儿童	古元等儿童团体
讽刺日军	《日本内幕》《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池》《持续战争厌战的日本兵》等	日军	汪子美等画家、团体组织

续表1

主题	作品	创作原型	创作者
反战、优待俘虏	《敌军反战图》《我们欢迎由日军跑过来的弟兄们,绝对优待俘虏》等	日军	军委会政治部等团体组织
盟国、盟军	《盟国四大领袖像》《门神》等	盟国领袖、盟军	南棣、军委会政治部等团体组织

上表显示,抗战期间,重庆宣传画作品题材丰富,除揭露日军暴行、军民英勇抗战、团结御侮等主题外,还有重庆大轰炸的主题,如王琦的《野蛮的屠杀》《肉弹勇士》等;呈现重庆印象的主题,如刘铁华木刻《赶场》等;讨逆汪贼叛国的主题,如黄尧《汪、汪、汪》、张谔《扩大反汪运动》等;反映大后方军民生产生活的主题,如丁正献木刻《苗胞生活》、宗其香木刻《湘西风光》等作品;在反战和优待俘虏方面,军委会政治部等团体创作了《我们欢迎由日军跑过来的弟兄们,绝对优待俘虏》等;^[17]同时,重庆抗战宣传画还创作了反映盟国、盟军的主题作品。如南棣木刻《盟国四大领袖像》等,体现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得到了众多盟国的援助,而并非孤军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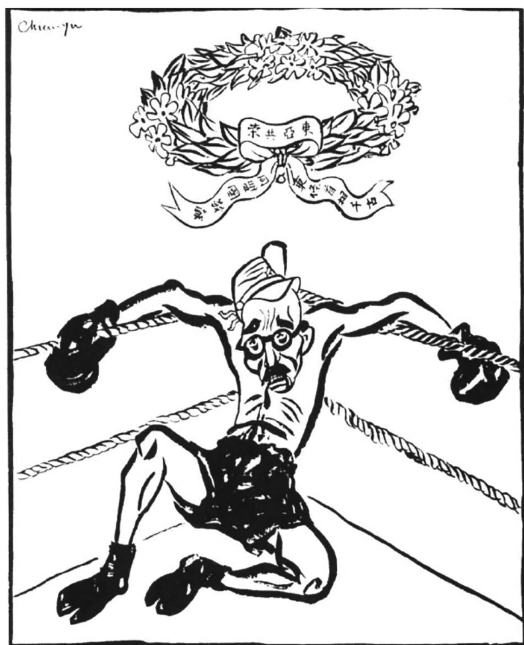


图1 《东条英机败下陈来》

创作者:叶浅予(20世纪40年代)



图2 《昭和天皇招大和之魂》

创作者:叶浅予(1943)

(二) 艺术语言的战斗性

众多“宁做流浪汉,不当亡国奴”的美术家,在重庆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的岁月,他们创作的大量抗战作品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独有的艺术特征,即语言的战斗性。

1. 夸张直观的表现力

用夸张、象征等艺术手法来塑造宣传画人物与生活场景是抗战宣传画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18]142}抗战宣传画区别于单纯的欣赏艺术,在于它要立足大众,激起民众抗日的热情,必需以丰富的想象力传达创意,以达到唤醒民众的宣传目的。重庆时期的抗战宣传画主要以木刻和漫画两种形式来表现,但战争造成的艰苦条件,使得很多美术创作的尺幅偏于小巧,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发挥着无穷的想象与创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艺术家们利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经过变形夸张的艺术处理,使宣传画显得内涵丰富、别有生趣。叶浅予的《东条英机败下陈来》和《昭和天皇招大和之魂》最能体现夸张直观的表现力。如图1和2两幅漫画就以夸张的笔法形象地讽刺了日本侵略者的邪恶嘴脸,并预示

了他们必败的命运结局。《东条英机败下阵来》以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为原型,创作者以一个拳击手被击败的场景来讽刺一个好战分子自食恶果的丑陋形象;《昭和天皇招大和之魂》巧妙形象地揭示了发动侵华战争者昭和天皇必然失败的宿命。这些风格犀利的抗战宣传作品构思巧妙、夸张直观,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与生动的宣传效果。

2. 生动通俗的叙事性

唤醒民众抗战需要创作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习惯并易于被其认知的内容,从而引起民众的广泛共鸣。^{[19][11]}

随着战事推进,抗战宣传画的主题也随之发展。因受传播对象与空间的限制,抗战宣传画的受众主要是大后方的群众。《新蜀报》第372期“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编木刻专页”刊载了张望的木刻《援助前方将士》(如图3),传达的就是大后方出钱劳军的实况,表现民众响应号召积极募捐的场景。^[20]画面近景是一个民众代表肩扛“出钱劳军”的旗帜,手举百元大钞,其眼神充满着期望,神情乐观坚毅,仿佛在说:“把钱送到前线去,送到前方去慰劳那些替我们流血的将士。”^{[13]32}远景则刻画的是一支正在赶赴前线的行军队伍,整幅作品人物刻画鲜明,内容简洁流畅,一气呵成。战时重庆是国民党陪都,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局所在地,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共合作。刘春安所刻的《为巩固团结而努力》发表在1939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上(如图4),这幅木刻作品就是反映当时国共合作的主题。创作者以简洁通俗的画面生动地表现出国共合作的历史真相,表达了万众一心才能铸成铜墙铁壁的思想。



图3 《援助前方将士》

图片来源:1941年3月1日《新华日报》



图4 《为巩固团结而努力》

图片来源:1939年7月7日《新华日报》

3. 妇女儿童感召力

抗战期间,以妇女和儿童为受众或者以其作为抗战宣传画形象也是抗战宣传画的一个显著特点,体现了抗战动员的“全员性”用意。

由于贫困落后,抗战时中国妇女80%都是文盲,针对她们普遍不识字的现实,中共南方局妇委会积极利用戏剧、图画、歌曲等非文字的宣传方式,尤其以壁报漫画形式张贴于街头巷道,成为向妇女群体宣传的主要形式。^[21]抗战时期日军对女性的暴行惨绝人寰,几乎无法以语言描述,宣传画中妇女受难的惨景无疑能激起广大妇女的强烈愤怒与反抗。与受摧残的女性形象比较,作为抗战参与者和后方支援者的形象才最具动员全民抗战的宣传目的。^[22]《战时妇女》(如图5-6)采用的是中英文结合的形式,通过画面的精心设计而生动地传达出抗战精神。中共南方局妇委会积极开展呼吁女性募捐活动,1939—1944年间,重庆市妇女界通过一系列募捐活动,筹得捐款约600万。^[21]广大女性除参与一系列劳军援军的抗战活动外,在大后方的生产建设、家庭教育中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儿童》第一卷第五期

发表的《儿童能做什么》就高度颂扬了母亲的伟大。^{[23]38} 抗战期间,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的孩子剧团,也是少年儿童积极参与抗战救国的独特力量。^[24] 1939 年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少年先锋队》,其画面由几位手握红缨枪并挑起少年儿童队旗的斗志昂扬的少年组成,刻画了年少爱国的火热情感,他们自发组织保家卫国、抗战杀敌的形象,感染了无数读者。这类作品在每年 4 月 4 日的儿童节出现最多,许多期刊推出的“儿童特刊”刊载了众多儿童创作的抗战宣传作品,充分展现了少年儿童作为抗战生力军的积极作用。



图 5 《战时妇女》

图片来源:1942 年 5 月 20 日《新华日报》



图 6 《少年先锋队》

图片来源:1939 年 10 月 2 日《新华日报》

(三) 作品发布的战地性

1. 多渠道的宣传

据统计,抗战时期,重庆共有 70 多家报纸,900 多种刊物,其中至少存在过 10 多种美术类期刊,这些刊物包括从武汉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发行的《抗战画刊》和《抗战漫画》,及在重庆创刊的《抗战艺术》《战斗美术》等。这些专业期刊具有鲜明的艺术及时代特征,即图文并茂,热情讴歌敌后的抗日英雄,鼓舞大后方民众的抗日热情,有些期刊拥有众多读者群,每期刊印数千份,在抗战宣传中发挥的作用确为不可小觑。^{[12]33} 许多美术工作者的优秀抗战宣传作品就是发表在这些刊物上。重庆还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全国性报纸,也专门开辟了美术副刊,以便刊发更多作品宣传抗战。^[20] 如代表进步力量并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全国木刻研究会成立后,为使美术界抗战宣传画传播效应最大化,《新华日报》专门设立了“木刻阵线”副刊,使之成为发表宣传画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这些报刊杂志还担负着集结全国各地美术工作者的任务,如由丁正献、王琦主编的《半月木刻》《木刻研究》等成为这些木刻工作者交流沟通的桥梁,成为抗战宣传画及时的传播载体。除此之外,关于抗战的美术史论、抗战的宣传画册等著作的出版发行也为重庆时期的抗战宣传画传播发挥积极作用。^[25] 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战时美术家们的积极对外交流,抗战木刻宣传作品开始走向国门,走向世界。如《木刻帮助中国人民战斗》这本木刻画选集在国外出版发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抗战木刻宣传作品随着交流传播的推进得到了国际读者的接受与喜爱,同时还获得了国外反法西斯组织的积极援助。^[7] 为明晰起见,笔者根据《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中的相关内容,对部分代表性的期刊传播抗战宣传画的相关内容作了进一步梳理,具体见表 2。

表2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报刊传播概况

年度	报刊	发表作品数	展览/活动报道次数	所刊评论文章篇数
1938 年	《新华日报》	15	1	
	《国民公报》	2		
	《战斗旬刊》 ¹			
1939 年	《新蜀报》			2
	《新华日报》	11	1	
	《国民公报》			1
1940 年	《新蜀报》	14		2
	《新华日报》	33		1
	《新蜀报》	30		10
1941 年	《新华日报》	3		
	《新蜀报》	34		20
	《新华日报》	10		1
1942 年	《时事新报》			1
	《新民报·晚刊》			1
	《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联合版			1
1943 年	《新蜀报》	13	1	10
	《新华日报》			1
	《新蜀报》	2		4
1944 年	《新华日报》			4
	《大公报》		2	
	《新蜀报》			7
1945 年	《新华日报》		2	
	《扫荡报》			1
	《新民报》	1		

说明:表中内容根据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龙红、廖科编著《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整理

数据显示,媒体对抗战美术的关注较为频繁,《新蜀报》和《新华日报》报道次数最多。自迁都后,在1938—1942年间,仅木刻和漫画形式的抗战宣传画年发表量平均都不少于10幅,其中还不包括儿童特刊发表的儿童木刻作品。作品紧密结合战争形势发展和年度时事焦点,如汪精卫投敌叛国事件,《新华日报》“文艺之页”副刊第7期发表了“重庆漫画界画讨汪逆”专版。为宣传木刻抗战事业和提倡木刻学习,众报刊还发表了艺术名家木刻评论文章,如徐悲鸿的《民以食为天——为全国木刻而作》、丁正献的《苏联木刻给予的影响》等评论文章;《新蜀报》副刊“半月木刻”第37期还就中国木刻研究会创办中华全国木刻培训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等。在1944—1945年间,抗战宣传画作品的报刊发表量相对较少,这时期更多的是利用展览形式来进行传播,并结合报刊媒介发表评论文章和有关展览的新闻报道,民众由此而可以及时地了解前线战事,积极响应抗战。

2. 集中展览的传播力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发布阵地还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展览上,尤其是自1942年起,全国木刻界开展了一项较大的工作,即定于每年的10月10日国庆日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分区举行“双十”木刻展览会。在推动全国木刻运动的同时进行广泛的抗战宣传,以求救亡图存。^{[13]262}1944年《时事新报》发表王琦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作品展览观感》中提到,“中国的画展近两年算是达到了最高峰,以重庆而论,去年一年一共举行了113次之多,平均3天一次,相当于两个影戏院映出的影片的数量,十倍于演出的话剧数量。”同年《新民报》发表的《画家赶集》中也写道:“在重庆,参观画展的机会特别多,似乎所有的画家都动员到这里来了,一年之中,几乎不间断地开展着展览会……”^{[13]288}根据展览时间和主题等内容,笔

者整理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抗战宣传木刻和漫画展信息,具体见表3。

表3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展览概况

展览时间	展览主题	展览地点	办展组织或单位
1938年2月21日	全国小朋友牛鼻子抗敌漫画展览	青年会	重庆市抗敌协会
1938年7月11日	重庆市木刻展	市商会大礼堂	重庆市木刻展览会
1939年1月10日	重庆劳军美术展览	社交会堂	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艺社
1939年2月26日	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漫画展览	中央球场公园	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
1939年10月19日	抗战图画展	中英年会 重庆、成都、山洞、歌乐山、磁器口、北碚	军委会政治部
1939年12月7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漫画队作品展	洞、歌乐山、磁器口、北碚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漫画队
1940年1月1日	新年抗战巡回展	不详	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
1940年1月1日	抗战建国木刻展	不详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
1940年1月6日	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漫画展	江津	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
1942年2月2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第一次木刻展	励志社	中国木刻研究会
1942年5月31日	中央大学现实版画社木刻画展	沙坪坝	中央大学现实版画社
1942年10月14日	第一届双十节全国木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国木刻研究会
1943年1月10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纪念成立一周年木刻展	夫子池励志社	中国木刻研究会
1943年3月16日	苏联版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苏文化协会
1943年3月26日	叶浅予漫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苏文化协会
1943年4月8日	苏联现代漫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苏文化协会
1943年10月2日	盟国画展	江津	江津图书馆
1943年10月11日	第二届全国木刻展	沙坪坝青年馆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木刻研究会
1944年1月22日	中华木刻研究会纪念成立两周年全国木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华木刻研究会
1944年5月4日	叶浅予漫画展	中印学会	不详
1944年10月16日	世界版画展	不详	中国木刻研究会
1944年10月16日	王琦木刻展	夫子池励志社	不详
1944年11月17日	王琦画展	夫子池励志社	不详
1944年11月18日	世界版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国木刻研究会
1945年2月10日	刘铁华木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不详
1945年3月16日	丁聪、特伟、叶浅予、余所亚、张文元、廖冰兄、沈同衡、张光宇漫画联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
1945年3月22日	高龙生、汪子美幻想曲漫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
1945年4月2日	高龙生、汪子美幻想曲联展续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
1945年4月13日	漫画联展	中苏文化协会	现代社
1945年4月19日	应观众要求高龙生、汪子美幻想曲漫画展三次续展	夫子池新运服务所	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
1945年5月1日	丁聪、张文元、余所亚、张光宇、沈同衡、叶浅予、特伟、廖冰兄漫画联展	沙坪坝青年馆	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
1945年7月6日	秦岭云、江敕、朱枫漫画展	中苏文化协会	不详
1945年7月28日	美国画家琼斯画展	中正路工人福利社	中国木刻研究会与星期漫画社联合主办

说明:表中内容根据龙红、廖科编著《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整理

上表显示,从正式迁都到抗战结束,相关展览活动非常频繁。如为宣传湘北大捷,1939年军委会政治部在中英年会举行了抗战图画展;针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1940年1月1日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举行了新年抗战巡回展;1942年2月2日中国木刻研究会在励志社举行第一次木刻展览,这次展览意义非同一般,在400余件的参展作品中有30多件是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1943年10月2日江津图书馆主办了来自苏联、美国等的盟国画展;同一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在10月和11月分别举行的世界版画展等,都体现了抗战时期宣传画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本土木刻画家王琦也在这一年分别举行了木刻展和画展;1945年抗战胜利,也是漫画展览大收获的一年,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多次主办了丁聪、特伟、叶浅予、余所亚、张文元、廖冰兄、沈同衡、张光宇的漫画联展,尤其是高龙生、汪子美的幻想曲漫画展还应观众要求连续三次续展,极大地体现了广大民众对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喜爱。这些丰富多彩的展览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民众的抗日热情。

四、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影响

抗战宣传画是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及语境中的艺术形式,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重庆作为当时的战时首都,救亡图存的宣传此起彼伏,内迁重庆的广大美术家在此民族危亡时刻倾注了满腔热情,创作出一幅幅生动激昂的画作,成为揭露日寇暴行、鼓舞民众团结、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有力武器。大后方活跃的美术队伍经常举办展览等抗战文化交流活动,使得抗战宣传画的影响力超越了地域之限,展现出强大的斗争潜力。在对外文化交流中,重庆创作的木刻画选集走出国门,并在国外出版发行,让世界上更多的读者民众了解到奋勇抵抗的中华民族精神,由此而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合作,鼓舞了正义者的士气。同时,聚集重庆的美术家们也为重庆宣传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这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画坛景象和艺术氛围。

抗战宣传画是抗战特定时期的一种艺术形态,属于现实主义的艺术范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它创造了悲壮而又独特的中国艺术内容,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由此而得以开启。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这种独特的艺术得到飞速发展,并在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后臻于成熟,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美术形式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内迁重庆的艺术院校师生和美术工作者们创作了大量以抗战史实为主题的战时宣传画。这些以简易直白的木刻版画和机智幽默的漫画,体现出画作题材的战时性、艺术语言的战斗性和作品发布的战地性等特征,展现了直观夸张的表现力、生动通俗的叙事性和全民抗战的感召力,以“满足大众审美口味”“一切为了抗战”为主旨,借助政治中心优势多渠道宣传、展览,其传播力辐射至全国,成为以无声的呐喊鼓舞军民团结抗战、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参 考 文 献]

- [1] 杨悦,汤祖雷.重庆抗战木刻版画的审美特征与当代创作启示[J].美术研究,2018(4).
- [2] 聂宏伟.宣传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敌艺术宣传上的运用分析[J].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7).
- [3] 霍楷,冯靖,周宏蕊.伪满时期抗战宣传画艺术特点和美学风格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4] 谢儒弟.重庆抗战文化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 [5] 代大权.鼎故与革新——论中国版画的再发展[J].美术,2021(12).
- [6] 李树声.怒吼的黄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
- [7] 张文松.梦在山外——民国(1912-1949)版画中的西方视角[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3.
- [8] 中国版画界元老王琦:“抗战木刻辉煌在重庆”[EB/OL][2015-08-28][2021-12-26]https://www.sohu.com/a/29719378_115428.

- [9] 丰子恺. 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J]. 抗战漫画, 1938(8).
- [10]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11] 傅以新. 记叶浅予先生[J]. 中国美术, 2017(2).
- [12] 李树声. 怒吼的黄河: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M].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5.
- [13] 龙红, 廖科.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 [14] 漆麟. “仓库画家”的妥当性: 林风眠在抗战时期的活动[J]. 抗战艺术研究, 2018(1).
- [15] 王晓华. 抗战海报[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16] 中国国家博物馆. 抗日战争时期宣传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17] 中国空军史上首次空袭日本, 没投导弹却投反战传单, 引得世界赞扬[EB/OL][2019-14-15][2021-12-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632876160112291&wfr=spider&for=pc>.
- [18] 郑立君. 场景与图像——20 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 [19] 王向峰, 吴玉杰, 徐迎新. 民族救亡的一道长城: 抗日战争的文艺战线[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5.
- [20] 老照片: 抗战时重庆春节劳军大会 支持抗战有钱出钱 现场热火朝天[EB/OL][2021-02-06][2021-12-28]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ROKLM6G0546SRWN.html>.
- [21] 章宁书. 抗战漫画中的女性形象建构[J]. 美术, 2022(1).
- [22] 姚霏, 马培. 抗战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5(4).
- [23] 付冬生. 论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9).
- [24] 蔡洁. 流动的宣传队: 儿童剧团与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以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中心[J]. 广东社会科学, 2022(2).
- [25] 陈艺瑞. 抗战时期四川宣传画研究(1931—1945)——以重庆、成都为中心[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8.
- [26] 何瑶. 从“战争书写”到“人民书写”: 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主题研究——以《抗战文艺》为例[J]. 当代文坛, 2022(2).
- [27] 李冰冰. 全面抗战时期游记中的重庆印象与内迁生活[J]. 中华文化论坛, 2021(6).
- [28] 陈谦平. 抗战大后方刍议[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qing Posters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Zhao Jingjing

(College of Fine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teachers, students and art workers of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o moved to Chongqing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Anti Japanese War themed posters, mainly including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woodcut prints, humorous and witty comics and unconventional new art forms. These works show intuitive and exaggerated expressiveness with the “wartime” of the topic selection, the “combat” of the artistic language and the “battlefield” of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works. The vivid and popular narrative power and the appeal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uch as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become another sharp weapon to reveal the atrocities of the Japanese army, encourage the people to unit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encourage the soldiers to kill the enemy bravely, and swear to fight the Japanese invaders to the end. This study also shows us that artists and artists in wartime are full of patriotic enthusiasm, have great national righteousness in mind,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artistic spirit of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e times.

Keywords: art of Anti Japanese War; posters; woodcut prints

[责任编辑: 左福生]